读懂剪刀差里的“供强需弱”

> 目前供强需弱的实质，不是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变导致的供需“错配”与“梗阻”。

□ 本报评论员 王春华

10月物价数据，把“供需失衡”推到台前。PPI同比上涨5.7%，创52个月新高；CPI同比仅涨0.7%，涨幅还在回落。5个百分点的剪刀差，是年内最显著的一次分化。

PPI的强势，有输入性因素，也有部分行业供给偏紧的叠加；CPI的温吞，则暴露出终端消费的底气不足。如果把这道剪刀差只当统计现象看，甚至庆幸“上游涨价没传到老百姓餐桌上”，就会错过政策窗口期最关键的警示。

价格是体温计，也是风向标。上游资源品涨价，对拥有全球最完备工业体系的中国而言，本不必然是坏事。只要下游需求旺盛、成本传导顺畅，就会温和再通胀，企业盈利改善，就业收入跟进。但10月生活资料价格环比持平甚至微降，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都涨不动。中下游企业夹在“原料贵”和“卖价低”中间，利润两头受挤。这种格局如若持续，伤及的将是微观主体的元气。

关于消费端的温度，“双11”也给了一个侧写。星图口径全网销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从两位数掉到个位数，平台自己也不再公布总GMV了。这不仅说明大促的拉动效应在衰减，消费者对“等一个日子集中买”的热情在退潮；把它放进“供强需弱”的框架里看，就是居民对收入与未来的预期偏谨慎，花钱这件事自然就慢了下来。这不是某一次大促的偶然降温，而是收入预期与消费意愿之间那道裂缝的显影。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一线城市挪开，画面又变了。前三季度，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达到39.1%，且仍在上升。GDP千亿县已超过75个，乐清、义乌、温岭等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超过全部一线城市。县城的“敢花”，一半是低生活成本给的底气，另一半恰恰反证了大城市消费遭遇“梗阻”的现实。

一边是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一边是亟待释放的有效需求。这道“供需天平”如何校准？9月以来，《求是》杂志连续三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从“立足优势”“改革发力”“政策协同”三个角度，递进式讨论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的矛盾。

三篇文章落点各有侧重，但指向同一个判断：供强需弱的实质，不是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变导致的供需“错配”与“梗阻”。这个判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板子简单打在“需求不足”上。我国已成长为GDP超140万亿元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受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健全等体制机制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受到制约。与投资驱动的供给能力快速扩张相比，消费需求扩张总体滞后。各地抓投资、上项目、扩产能，轻车熟路；怎么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往往落在后面。

也有观点认为，外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内需。但实际上，外需与内需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促、以内需为主的关系。把外需当作内需的替代品，在理论上站不住，在经验上也多次被证明行不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在《求是》后续刊发的《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文中，把问题推向深入。她强调，当前供强需弱“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根子在于“重生产、轻分配的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出口导向的特征依然明显”。企业产能配置长期优先海外，对本土需求响应不足，一旦外需收缩，前期围绕出口形成的产能便成为压力。

10月的剪刀差是一张诊断书，照出的是供强需弱的深层病灶。而供强需弱的抹平，是一场从“生产型激励”转向“消费型激励”的深层调整。它既需要14亿多人口和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所蕴含的消费升级潜力来托底，也需要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改革举措来破题，更需要财政与金融协同、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衔接来形成合力。

事实上，政策在持续发力。以旧换新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撬动比达1比10.3，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同步推进，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被摆上桌面。说到底，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靠就业托底，就业靠预期支撑。唯有百姓钱袋子鼓起来、预期稳下来，剪刀差才能真正收窄，消费型激励的深层调整才能落地见效。



画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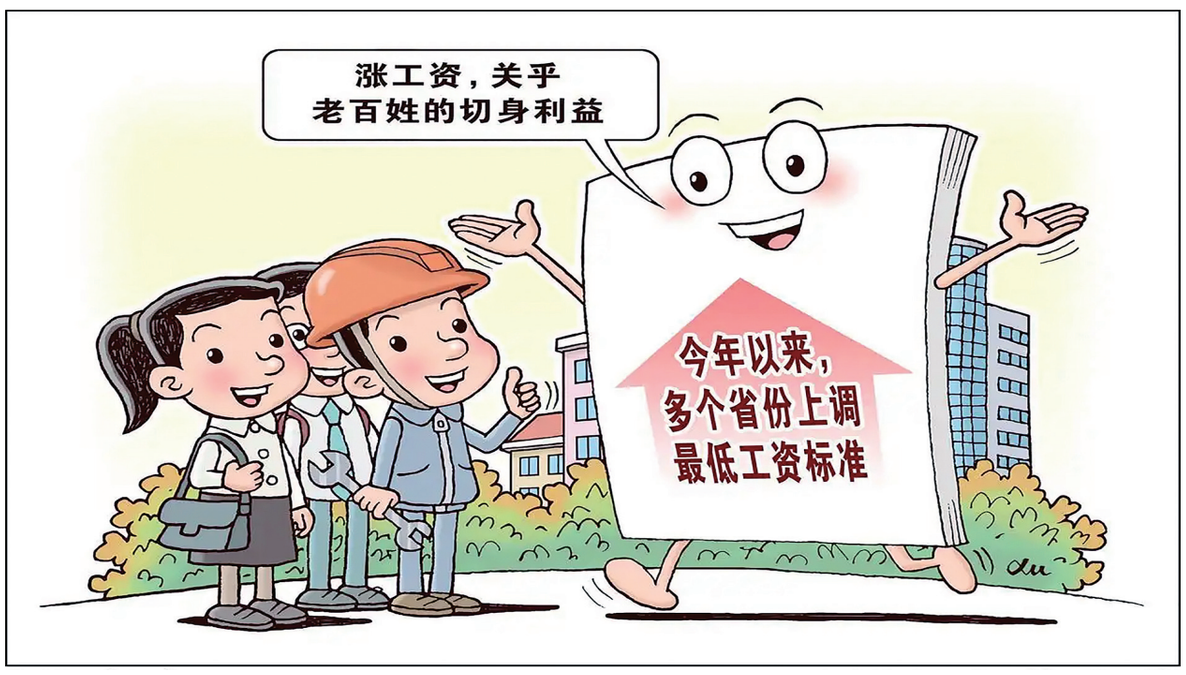
底线抬升的意义

□ 子 卿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最低100元、最高超200元。调整后，全国各省区市第一档月最低工资均已站上2000元关口。这条“底线”的上移，直接惠及的是基层一线劳动者。

最低工资不是孤立数字，它同时是试用期工资、病假工资、失业保险金乃至工伤伤残津贴的参照基准，标准一动，一串待遇跟着动。

当然，底线抬升也要量力而行。对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用工成本压力真实存在。各地在“涨”的同时，需给企业留出消化空间，让托底与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须着力防止四种倾向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这四对关系，每一对都包含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实践中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观念，防止片面化、绝对化、一刀切。把握好这四对关系，重点要防止以下四种倾向。

> 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每一对都包含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实践中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观念，防止片面化、绝对化、一刀切。

防止“政府越位、市场缺位”的错位倾向

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是让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各归其位、协同发力。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二者共同培育和驱动的结果。政府“有所为”的重心，应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搭建舞台；有效市场的要义，在于让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向、让竞争分出优劣。二者不是谁替代谁的关系，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公共品供给和规则维护到位，市场才能在公平竞争中有效配置资源；市场信号越真实，政府规划引导才有据有效。

这一关系把握不好，容易出现“政府越位、市场缺位”的错位倾向，即政府越过弥补市场失灵的边界，用行政竞价替代市场竞争。目前，个别地方不顾产业基础仓促上马未来产业项目，以零地价、过度补贴争夺投资，甚至举债铺摊子，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选择。这类行为的共同特征，是政府进入了自己不擅长、也不该进入的领域，替市场选技术路线、替企业定产业赛道；与此同时，基础研究投入、中试平台建设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环节反而投入不足，越位与缺位互为表里。《意见》强调有所不为，就是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越规范，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越充分。守牢边界，协同才有基础；以行政竞价替代市场竞争，统筹就会落空。

防止“只抓新兴产业、轻视传统产业”的窄化倾向

统筹好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就是要把质优作为所有业态发展的导向，要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联动发展。质态是生产力的内在品质，业态是外在表现形态。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跃升，不是某个或某些具体产业的标签，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经数智化、绿色化改造同样能催生新质生产力。是否新质生产力不在于产业目录的新旧，而在全要素生产率能否得到实际提升。

这一关系把握不好，容易出现“只抓新兴产业、轻视传统产业”的窄化倾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将其列为需要纠偏的苗头性问题，指出“有的片面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意见》在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时，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列在首位，这一顺序本身就是鲜明的政策信号。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约八成，产业政策如果只盯着约两成的高技术制造业增量，而忽视占大头的存量改造，新旧动能断档的风险就会上升。

防止“重发展、轻改革”的失衡倾向

统筹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就是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供给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二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没有改革拆除制度壁垒，发展的成果会被旧框架卡住；不用发展检验改革成效，改革就容易沦为纸面文章。

这一关系把握不好，容易出现“重发展、轻改革”的失衡倾向。在“抓发展见效快、抓改革见效慢”的“显绩”偏好下，改革容易被生硬地排到发展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明确，“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四条原则，是针对“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苗头性问题的纠偏；一些地方“割裂发展、改革任务，没有将改革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要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改革并不直接创造新质生产力，它拆除的是阻碍既有创新资源流动的壁垒。缺少这一层制度供给，项目清单列得再长，落地效果也会打折扣。

防止“关起门来搞创新”的封闭倾向

统筹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就是要厘清哪些领域优先“以我为主”、哪些领域更多“借力扬帆”。自主是开放的底气，开放是自主的检验场。关键领域立足自身，才能在开放合作中有平等对话的筹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倒逼国内创新主体在竞争中升级。二者协同共进，缺一不可。

这一关系把握不好，容易出现“关起门来搞创新”的封闭倾向，把“自主可控”误读为“自我封闭”，用安全考量替代开放逻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数据、技术、资本天然具有高度流动性，只有主动融入国际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利用全球优质要素。目前，在一些地方实践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自主可控”为名，对国际创新要素参与设置不必要的壁垒，把安全考量泛化到一般性技术合作领域；另一种是口头上讲开放，实际工作中对外资研发中心、国际人才引进、数据跨境流动等缺乏制度安排。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一些地方若在这个窗口期选择“关起门来”，失去的不仅是外部要素，最终也会失去国内创新主体升级的全球竞争优势。自主不是封闭，开放不是依附。关键领域必须立足自身，但立足自身绝不等于拒绝合作。

（黑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所供稿）

走无创普惠之路 激活脑机消费新蓝海

——专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李志强

> 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脑机接口正处于从实验室探索走向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转折点。在这场关乎未来产业格局的竞赛中，湖北应当选择怎样的技术路线？如何将前沿科技转化为惠及亿万大众的民生福祉？

□ 夏品松 王国荣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脑机接口，这个曾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十五五”时期加速走进现实。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脑机接口正处于从实验室探索走向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转折点。在这场关乎未来产业格局的竞赛中，湖北应当选择怎样的技术路线？如何将前沿科技转化为惠及亿万大众的民生福祉？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李志强。

记者：脑机接口在很多人印象里还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您为什么认为它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李志强：这恰恰是我想澄清的一个认知误区。脑机接口不是高高在上的“黑科技”，而是切切实实关乎亿万家庭健康的民生刚需。

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人，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疾病发病率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睡眠障碍人群超过3亿，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亚健康人群规模庞大。这些疾病和亚健康状态，长期缺少安全、便捷、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方案。

脑机接口技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它通过采集和解码大脑神经信号，实现人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既可以对神经功能障碍进行康复训练，也可以通过物理调控手段改善脑功能状态。这不是锦上添花的“炫技”，而是解决现实民生痛点的“刚需技术”。

全球脑机接口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前后突破千亿美元。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如果不能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动，不仅会错失巨大的产业发展机遇，更会在关键医疗装备上受制于人。关注脑机接口，不是追逐风口，而是立足国情、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记者：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在布局脑机接口。湖北要想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底气在哪里？

李志强：湖北的底气，可以用“一库、一链、一市场”来概括。

“一库”是丰富的临床资源库。中南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汇聚于此，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个学科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迭代，离不开临床场景的验证和反馈，这正是湖北的独特优势。“一链”是光谷的科创生态链。脑机接口涉及芯片设计、信号处理、人工智能等多个技术维度，光谷的科创生态可为硬件研发、算法优化、产品制造提供有力支撑。“一市场”是广阔的中部消费市场。湖北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日益增长的健康消费需求，可以为脑机接口产品的商业化落地提供广阔空间。

这三个优势叠加在一起，是很多地方不具备的。湖北有条件、也有能力在脑机接口领域闯出一条路来。

记者：在这些基础上，湖北应该走哪条技术路线，是跟风做侵入式，还是另辟蹊径？

李志强：这个问题需要冷静思考、科学判断。首先必须承认，侵入式脑机接口具备重大的科研价值和战略意义。它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颅内，可获取更高质量的神经信号，在帮助重度瘫痪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等方面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成果。这类技术攻关是国家科技实力的体现，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但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侵入式路线面临多重制约，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闭环，更多承担前沿科学探索使命。

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路径与侵入式方案存在本质差异。该技术无需开展开颅手术，可通过脑电、近红外、超声等多模态途径同步采集脑信号数据，并依托数据解析方法与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完成原始脑信号的特征提取与精准解码，将隐秘的脑神经活动转化为可量化、可解析的有效信息；在此基础上，该技术可进一步借助超声、光、电、磁等多模式非侵入式刺激技术，对大脑实现靶向、可逆的神经调控。该技术天然具备安全无创伤、可重复应用、成本可控的突出优势，既能够满足医院神经康复、精神障碍干预、老年慢病治疗等刚性医疗需求，也可延伸应用至睡眠调理、情绪舒缓、居家康养等大众健康场景，可构建覆盖“院内诊疗、机构康养、家庭自用”的多层次市场空间。

我的判断是：无创模式是能够真正拉动消费的产业发展模式，是贴合湖北省情、务实精准的战略选择。

记者：路线选定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落地。无创脑机接口如何从实验室走进诊室和家庭？

李志强：临床场景的持续迭代，是无创脑机接口从医疗技术转化为消费产品的关键纽带。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惠及大众，离不开可复制、标准化的临床方案支撑。

中南医院围绕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重点布局了神经康复、老年退行性疾病干预、亚健康干预、精神心理疾病调控四大领域。同时，我们与武汉本土神经调控脑机接口企业依瑞德集团建立了“医企深度绑定”的协同创新模式。临床端提供真实诊疗需求，企业端据此优化硬件、迭代算法。这种“临床出题、企业研发、试验验证、产品上市、市场反哺创新”的正向循环，破解了科研成果落地难、产品与临床脱节的痛点，让技术疗效可验证、成本可管控、市场可拓展。

记者：从“临床可用”到“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还需打通哪些关节？

李志强：推动从“临床可用”到“普惠可及”，需要在三个层面形成合力：产品层面，分层打造。面向医院的医用版，聚焦精准诊疗，走医保支付；面向康养机构的机构版，聚焦日常健康管理，走机构采购；面向家庭的消费版，聚焦睡眠改善、压力舒缓等轻量级需求，走个人消费。三个层次适配不同付费模式，兼顾医疗公益与市场增值。

标准层面，加快建立。技术可以迭代，但没有标准就无法规范发展。要积极推动临床有效性评价、安全性评估、操作流程等标准制定，为产品注册审批和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政策层面，推动衔接。新型医疗器械如何纳入医保、如何界定消费级产品的监管边界，都需要政策引导和支持。

当无创神经调控设备走进康复科、心理科、社区养老中心乃至普通家庭，前沿科技就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催生全新的健康消费品类，为内需市场注入新动能。